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学术通讯

Newsletter

No. 1 2015

总第三十三期

2015年3月17至21日，我院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合作举办的第三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在京都大学举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志强带领文史研究院及中文、历史等相关学科的13名博士生与会。

研讨会共分为四场，主题分别为:“东亚世界的文学和语言”、“东亚的思想”、“东亚的社会与地理”和“亚洲的文物与艺术”。13名复旦博士生与京大7位博士生生、海德堡大学的2位博士生共同在研讨会上发表报告，同时还有15位京都大学的研究生对具体报告进行了详尽的点评。

3月19至20日，两校师生分别参访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琵琶湖疏水纪念馆、琵琶湖博物馆等处。

目　　录

第三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纪行

/□周　洁　文史研究院博士生 …… 2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记/□段志强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6

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小史——以盐谷温和仓石武四郎为中心

/□大木康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9

2014 年韩国燕行文献研究综述

/□郑　珉　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韩　东　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13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九十二至九十五场)

菅　丰　新地方史——重新审视微观史学 …… 17

Judit Bagi　安龙祭土与开财门之仪式在当代云南 …… 18

张　总　观音经图——以《高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等为主线 …… 19

Vince Ungvary　在华耶稣会士的地图绘制 …… 20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第四十四期) …… 21

新书介绍　《同文书史》、《早期中国的公共记忆》、《首航》 …… 23

外刊撷英 …… 26

2015 年“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暑期班招生简章 …… 30

文史研究院 2015 年专职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招聘启事 …… 32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5.01—2015.03) …… 34

第三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纪行

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21 日，由京都大学、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在日本京都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此次由研究生院楚永全副院长、文史研究院段志强老师率队，13 名复旦博士生与京都大学的 7 位博士生、海德堡大学的两位博士生共同在研讨会上发表报告，同时还有 15 位京都大学的研究生对具体报告进行了详尽的点评。参会同学的专业涉及中国语言与文学、中国哲学、历史地理、亚洲宗教艺术与考古等各个学科领域。

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于 3 月 17 日 9 点，在京大文学部新馆 2 楼第 4 教室正式举行。出席开幕式的有复旦大学楚永全老师和段志强老师；日方有京都大学副校长北野正雄先生，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的平田昌司教授、杉浦和子教授、木津祐子教授、宇佐美文理教授和绿川英树副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Ruldof G. Wagner）教授也应邀出席。开幕式由杉浦和子教授主持。首先北野先生代表京都大学致辞，对于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楚永全先生对两校的办学理念做概括，希望两校的博士生能够建立起长久的联系。八木坚二代表京都大学的同学欢迎此次参会的博士生。开幕式中京都大学与复旦大学校方代表互赠礼物。

此次研讨会的报告时间为一天半。17 日上午第一场的主题为“东亚世界的文学和语言”，主持人为京大的佐藤礼子。复旦周硕首先报告《从语义地图看上古汉语介词“于\於的一种特殊用法”》，通过跨语言考察，梳理上古介词于、於的各项功能用法，建构其语义地图，在最后还指出语义地图模型的局限和不足。京大铃木史己讨论《试论修饰成分“洋”的性质—以〈肥皂〉一词为例》，利用 PHD 系统绘制方言地图，把“洋”对肥皂一词的修饰成分划分成洋碱型、肥皂型和胰子型，并且认为“洋”是具有辨别功能的前缀。复旦吴洪斌的报告题为《唐诗与唐镜的对读——以“琴”的意象为中心》，报告人以琴为线索，用实物与诗歌对读的方式，认为唐代文士对于琴的趣味不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倾向，也实践在具体追求的生活中。京大杨维公讨论《〈桃花扇〉与“中国式近代”》，以孔尚任的《桃花扇》为线索，结合时

代背景，从梁启超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论出发，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解读，认为文学中的“中国式近代”起源于明末清初。复旦翟墨的报告题为《元代追谥杜甫考》，通过考察元代追谥杜甫为“文贞”一事的时代背景、政治意涵，揭示此事是蒙元政府带有修正伯颜极端排斥儒士而向儒家文化倾斜的象征性举措。京大祝世洁报告题为《在集体意识和文人自持之间——1930 年代左翼文人郑伯奇的困境》，讨论郑伯齐如何不满于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相互绑定而重新审视文学的艺术性，其主编的《新小说》正是艺术与通俗成为可能的尝试。之后京都大学的八木坚二、山本浩史、佐藤礼子针对以上报告分别提出点评意见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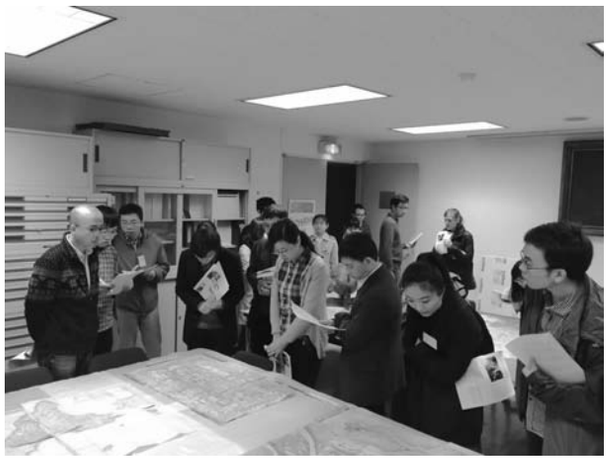
下午 1 点钟开始的第二场报告主题为“东亚的思想”，福谷彬担任主持人。复旦冯超的报告题为《略论佛教传入越南的几种途径说》，报告讨论了学界的主要观点，分别是早期佛教传入越南的海陆说、中古时期的陆路说以及海陆、陆路途径兼有说。复旦徐渊的报告题目为《西汉〈尚书周官〉篇与〈周官〉名称纠葛小考》，通过文本释读，认为《史记》中所称之《周官》均为《尚书·周官篇》，进而说明司马迁很可能并未见过今本《周礼》，并将今本《周礼》的流布时间定为新莽时期。京大陈佑真讨论《待宋之王以为法——苏轼〈书传〉解经思想简论》，报告人从宋代经学人情化的角度出发，重新考证了《书传》的根本性质，认为苏轼在解释《尚书》时，多次与北宋政治情况相对照，以重人情为立脚点，从中可窥见他为宋朝作经解的意图。海德堡大学徐淳以大理、鹤庆府为中心，讨论《水旱之患与明代南坝区的龙神信仰》，报告人利用云南方志、碑刻、传说等材料，从叙事方法、修辞手法等角度，分析明代云南地区水神崇拜中所隐含的水患观念，并试图讨论不同灾害观念的碰撞与交融。复旦许赛锋以《论“同文同种”表述的诞生》为题，探讨近代中日关系的变迁，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人种竞争概念被引入政治语境，导致国人对“同文同种”概念有着不同的认知，从而展现出两国关系在近代历史中的多面性。复旦胡嘉麟以淮安总管府的儒学为例，讨论《儒学与儒法：宋元时期的祭器礼仪》，报告人从考古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宋元儒学祭器对域外汉文化圈的影响如何导致祭器形制的变化。京大的古胜亮、田访、福谷彬三位博士生对以上发言做总结和点评。

第三场报告主题为“东亚的社会与地理”，主持人为松谷実のり。首先京大徐尧基于农户视角满意度的调查分析，探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参加中国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社的家庭为分析对象，认为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变量并未对新农合的医疗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而其主要影响因素集中在农户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卫生服务以及新农合利用情况。复旦董坤以 2013 年中国居民赴日旅游为例，以《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民宿旅游研究》为题，总结国民赴日旅游的四种主要动机，据此将游客划分为三类群体，目的是可以提出更具时效性与指导性的营销策略。海德堡大学的 Biehler Anja 讨论《国民政府对战犯的审判，1946—1948》，通过对战后审判的研究，进一步探究中日关系中一些被忽略的因素，为处置二战善后工作提供新角度。复旦余开亮从清代中期中国是否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出发，讨论《清代的市场整合与空间结构研究（1738—1820）》，从研究结果看与施雅坚的大区域理论可以做对应。复旦闫芳芳的报告题为《民国时期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河网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报告人在 MapInfo 环境下应用 Gridmaker 分别构建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地区格网体系，通过分析认为珠三角、长三角河网内部结构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并且直接影响河网水利灌溉的统一管理，最终造成河网系统运作受阻。京大姚逸苇、松谷実のり、綱岛圣对上述报告做了细致点评与提问。

18 日上午九点半开始本次研讨的第四场，主题为“亚洲的文物与艺术”，成田健太郎主持。复旦周洁以《五代、两宋大足地区星曜造像的图像学研究》为题，报告人通过对该地区的相关造像分析，结合其他地区的绘画、抄本等，讨论这一题材造像如何渐次受到道教影响，并产生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像样式。复旦杨洁报告题为《蒙元世相：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通过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揭示这批陶制墓俑及明器随葬的区域特殊性，以及唐宋以来堪舆术在民间的应用，并对蒙元镇墓神煞俑进行补充和代替。复旦陈玲以《北宋“日本刀歌”的唱和关系及其所咏日本刀

的来历》,通过对司马光、梅尧臣日本刀歌唱和关系的考察,进一步推测钱君倚日本刀的来历。报告人通过对两首诗的解读、推测,对于这把流转于中日两国的刀做了较为合理的情景还原。京大王俊钧以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为中心,讨论《绘画理论中的养生观》,认为画论中折射的养生观,很大一部分来自董其昌对道教内丹的青睐,以及对黄公望艺术的情感转移;观赏与创作山水画的方式,成为文人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京大松叶久美子讨论《汉代画像石中的"羽人"》,通过文献与实物图像的对应,辨析了"羽人"与"仙人"的两种形象,认为这种区分有助于探讨仙人的产生以及早期道家与道教思想。京大廖明飞、金东镇、成田健太郎对以上报告作出点评与提问。

研讨过程中平田昌司、杉浦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绿川英树、瓦格纳、楚永全、段志强诸位老师全程聆听并给予同学们指导意见。18 日中午 11:45 最后一组主题报告结束后,杉浦教授主持闭幕式。瓦格纳教授在闭幕式上做总结。他坦言,起初还担心是否需要拟定某个统一主题以便讨论,但听了所有同学的讲演后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与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介有关,这就是隐藏的主题。瓦格纳教授对于此次博士生研讨会的内容、形式、效果都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今后海德堡大学也可以加入到主办单位之列。平田教授也对此次研讨会给予积极评价,并宣布闭幕。参加闭幕的老师还有宇佐美、木津、绿川、楚永全、段志强。会议结束后,全体成员与各位老师在京都大学标志性建筑时计台前合影留念。



19 日上午九点半至十点半,京都大学的網岛圣、郭云蔚、苏小津同学以《京都的水与琵琶湖》为题,为大家讲述京都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的关系。上午 11 点在山本浩史、古胜亮与成田健太郎同学带领下,与会人员参观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京大专门开放综合博物馆地理作业室和古地图室、民族资料室供诸位师生近距离参观。山本同学特别为大家介绍了 1402 年在朝鲜绘制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摹本、日本制法尔克式古地球仪、《平安城并洛外之图》、《浅间山烧之图》、《东西蝦夷山川地理取调图》等珍贵藏品。

19 日下午参观京都大学周边的名胜古迹。在烟雨迷蒙中沿着哲学之道一路行来,大家依次参观永观堂、南禅寺。除了传统的伽蓝建筑,南禅寺内还有一座罗马式水利工程建筑,建于明治时期的"水路阁"。最后在工业遗址琵琶湖疏水纪念馆中结束一天参观行程。

20 日,参会人员八点钟从京都御所附近住处出发,乘大巴走国道 367 线约一小时到达参观地琵琶湖。琵琶湖位于京都东北滋贺县,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邻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横卧在经济重镇大阪和名古屋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并且是京都市饮用、灌溉、发电的重要供给水源。琵琶湖保护区域内,有一座按照 1960 年代生活状态所建造的生活实验工坊,木质民居里面的布局、摆设也都按照传统民居的样貌。大家聚坐其中,研究人员详细为大家介绍琵琶湖的历史、生态特点以及日本五十年前的生活状态、器具等,希望参观者可以通过这间生活实验室,对日本过去的生活状态

有所了解。接下来参观琵琶湖博物馆,伴随着研究人员的精彩讲解,同学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琵琶湖水域变迁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下午一点从博物馆出发,继续驱车1个多小时,到达琵琶湖最西北边的海津地区。一直到江户时代,从京都和大阪运送的物资都在此卸货,海津是连接日本东西走廊和沟通太平洋与日本海的重要通道。沿着海津港口的石墙一路走去,大家参观了吉田造酒厂,吉田先生详细讲述海津地区的酿造状况和造酒流程。下午六点半返回京都,所有参会同学与诸位老师共进送别晚餐。

21日,平田、杉浦、木津、宇佐美老师和杨维公同学到宾馆为复旦大学师生送行,第三届“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所有活动圆满结束。□

周　洁　撰文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记

段志强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5 年 1 月 5 日到 2 月 15 日，我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中国研究的重镇，也保持着它在国际汉学界的重要地位，访问月余，收获良多。

到东京以后，先受到曾来我院访问的大木康、张馨元、钟以江等老师的热情接待和照顾。按照日程安排，1 月 8 日，我与先期到访的我院副研究员张佳一同做了学术报告。张佳报告的题目是《明朝初期的汉族元遗民》，他认为，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他们以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行为方式表达其政治立场。他并指出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我报告的题目是《晚清中国的禁书阅读》，以新出版的《管庭芬日记》为例，展现晚清普通读书人接触到曾遭禁毁的书籍的情况。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政策，导致大批书籍被禁止出版、流传和阅读，直到嘉庆朝以后，才又开始慢慢出现，这是近世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管庭芬的例子表明，清代前期禁毁书籍的政策相当成功，以至于当禁书重新出现的时候，不仅没有成为危害政权的力量，反而成为支撑危局的精神资源。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高见泽磨、大木康、平势隆郎等教授，在东文研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都参加了报告会，并且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汉籍收藏十分重要。对于禁书研究来说，有两方面的收藏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明末清初作者的集部书，二是通俗文学类的作品。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也有一批汉籍收藏，多以西式硬壳重新装帧，反应出日本近代化初期对于书籍的态度。最引人注意的，是附属图书馆收藏的大批地图，包括各类民用地图，也有许多当年日本军方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实测地图，价值甚大而利用率极低。此外，还有一大批与伪满洲国和日本东北殖民有关的原始档案资料。利用访问的这段时间，我除了就禁书这个题目搜集到若干材料以外，主要的精力放在博士论文的修订出版上，取得了计划中的进展。

1 月 13 到 16 日，应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科木津祐子教授的邀请，我和张佳一起到京都大学文学部访问，拜会了平田昌司、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绿川英树等教授。14 日，我们在京都大学文学部联合做了一场报告，张老师继续介绍他关于明初元

遗民的研究，我报告的题目是《作为纪念物的年谱——以十三种顾炎武年谱为例》。顾炎武是清代拥有年谱数量最多的传主，民国之前先后有十三种顾炎武年谱编纂完成。这些年谱不仅是记载人物生平的史籍，也是具有纪念功能的纪念物，编纂者通过对顾炎武相关史料的搜集、辨析、剪裁、编辑，有意地塑造出不同面貌的顾炎武形象，从而成为参与社会变迁的思想来源。报告会之前，木津祐子教授带领我们参访了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以研究室为单位，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研究室的汉籍收藏最多，以四部分类，张佳还在其中发现了稀见的民国张其淦著《元八百遗民诗咏》的原刊本。

京都古迹众多。京都大学及其博物馆之外，我们还到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寺、东本愿寺、东福寺、伏见稻荷大社、鞍马寺、贵船神社等处参观。

在东京，我先后参观过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科学馆、东洋文库、根津美术馆等机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洋文库。东洋文库是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位于东京都文京区，距离东京大学不远。东洋文库的基础，是1917年三菱财阀第三代主持人岩崎久弥收购的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乔治·莫理逊（George Morisson）有关中国及日本书籍的藏书，逐渐扩张到今日规模。如今东洋文库早已不限于与中国或日本有关的书籍收藏，而将收藏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包括原始资料及各种语言的研究著作。在东洋文库图书部负责人、日本学士院会员田仲一成先生的带领下，我有幸进入书库参观，见到大批珍本善本。但印象最深的，却是东洋文库对于朝鲜、越南及藏文、满文文献的收藏，即便是这种文献存世量有限的收藏主题，东洋文库也聚累起成规模的图书收藏，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1月26日，我拜见了原东京大学副校长、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渡边浩先生。渡边先生去年曾来我院参加以朝鲜通信使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因此相识。见面后，蒙渡边先生指教我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并承他带领，参观了汤岛圣堂等处。汤岛圣堂虽是孔庙，但与中国孔庙的规制相差甚远，与神道和佛教为主的日本宗教系统也显得格格不入，不但前来参拜的人十分稀少，更重要的是不像神社和寺院那样有约定俗成的参拜礼仪，结果来圣堂的日本人只是左右观望，不知该如何是好。其他参观的地方还有皇居、东京车站及东京邮政局、银座等地，感觉到日本对于本国近代化成绩的自豪感，实际上构成现在日本国家认同的基本骨架，反而是古老或号称古老的文化传统，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重要。

我还到了位于皇居附近的出光美术馆参观，其时该美术馆正在举行"物语绘"的专题展览。日本有着叙事或纪事绘画的强大传统，描述历史事件或文学场景的绘画非常发达，这些与《源氏物语》有关的绘画作品主题虽同、风格各异，令人大开眼界。联想到东京国立博物馆中丰富的日本美术收藏，可以明白今日日本动漫的繁荣恐怕也就这种绘画传统的积淀作用在。一个小小的感受，是日本绘画中对火的表现很多，火也往往处在非常醒目或中心的位置，相比之下，重视描绘静态场景的中国绘画里面，几乎很少见到火的形象，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今日的东洋文化研究所，由中国研究、西亚研究、南亚研究和"新世代亚洲研究"等几个部门组成，是全面覆盖整个亚洲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方向也从重

视古典和历史的研究，逐渐向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研究发展，由于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新鲜血液的加入，学术实力仍然极为雄厚。但就整个日本汉学界而言，不容忽视的趋势是，传统的汉学研究正在收缩，而与现实情势直接相关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体现在大学教育上，一则是研究生中中国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日本本国学生选择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学生越来越少，二则有些与中国古典有关的教职和研究职位也相应地遭遇压缩的风险。

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访问于春节前结束。时间虽短，见识颇多。2 月 3 日我观摩了东大附近根津神社节分祭的追傩式，眼见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古代仪式出现在异国，那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亲切感。可是在更多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日本社会与中国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早已达致相当深度，倘若中国要在东亚发挥更重要、更正面的作用，也许应该如日本、如东洋文化研究所一样，对邻国进行深入而持续的研究吧。□

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小史

——以盐谷温和仓石武四郎为中心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建校时。当时的汉文学作为东大最早的学科之一,与和文学一起组成“和汉文学科”,与“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共同成为当时有关“文学”仅有的两个学科,可见其地位之重。1886年,东京大学更名帝国大学,下设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汉文学也随之独立为“汉文学科”。

1910年,文科大学改制,学科重新调整设立为“文学”、“史学”、“哲学”,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学科分别为“支那文学”、“东洋史”和“支那哲学”。我认为,这一将“汉文学”改为“支那文学”的举措意义很大。日本人惯于读中文书籍,对中国的文言文也不陌生,因此“和汉”一词中的“汉”多少带有一点日本化的味道。而“支那文学”则与当时的“日本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等并列,开启了把中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外国文学进行研究之路。1919年,文科大学再度改制,称为文学部,并沿用至今。

从前大学有讲座制度(academic chair system),“讲座”是最基本的学术单位。每个讲座都设有一位教授、一位助教授,外加一位助手。起初,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共有三个讲座。随后,第一讲座与第三讲座合并为中国哲学讲座,而第二讲座则与后来增加的“中国言语文化讲座”一起组成了中文研究室的两个基本学术单位。所以那时的中文研究室拥有两位教授、两位助教授,共四位老师,分属古典诗文、古典戏曲小说、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四个不同领域。

盐谷温先生曾经担任第二讲座的教授,随后继任的便是仓石武四郎先生。接下来我将主要介绍这两位先生。

盐谷温先生号节山,出生于书香门第,世代以汉学传家。他的伯祖盐谷宕阴先生曾在江户末期幕府大学“昌平阪学问所”任教授,后来东京大学教授岛田重礼便是他的学生。岛田重礼十分尊重清朝汉学,重视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而他的学生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也继承了这种学统。节山先生的祖父盐谷簧山也是一位汉学家,曾在江户幕府为官,并在甲府一所学校“徽典馆”任教职。节山先生的父亲盐谷青山曾担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汉文教授。学生们接受通识教育,而汉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后来上大学并“发迹”的学生们,包括仓石武四郎先生等,都曾上过青山先生的汉文课。盐谷温后来去欧美访学时,便经常受到时任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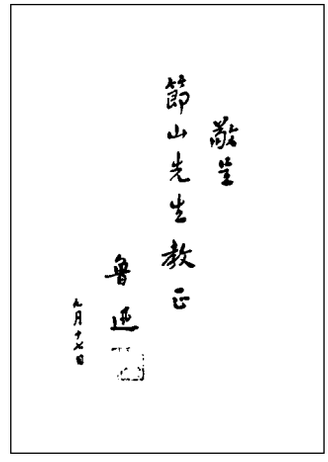
官的父亲的学生们的帮助。

盐谷温先生1878年生于东京，他首先在当时的皇家学校学习院与贵族公子一起接受教育，随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由于家学关系使然，盐谷先生选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读书。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学习院教书。他晚年曾写过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天马行空》，此书由他在学习院教过的学生武者小路实笃作序。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近代著名白桦派小说家，而白桦派作家都是学习院出身的贵族子弟，基本都上过盐谷先生的汉文课。1906年，盐谷先生进入帝国大学任助教授，有趣的是，同年他便受学校派遣出国访学，为时五年半。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大学对年轻学者的殷切期待，帝国大学作为引进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的重要机构，对学者提供了充分的经费支持。盐谷先生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读书，后来到中国停留了两年，第一年在北京，第二年在长沙跟随叶德辉先生读书，1912年因辛亥革命回到日本。归国后，他于1919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升为教授。随后，他继续在帝大任教20年，1939年退休，1962年去世。

盐谷温先生有很多著作，最重要的成就当属戏曲小说研究。在当时，戏曲小说之学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而出身于正统汉学世家的盐谷先生为何对戏曲小说产生研究兴趣呢？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他在帝国大学读书时，曾跟随森槐南上课。森槐南之父森春涛是明治时代颇有名气的汉诗人，深受清末陈文述、张问陶一派的浪漫诗风影响，其诗歌风靡一时。森槐南受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在作诗、作词、甚至写中文戏曲上也很有天赋，盐谷先生曾听他讲授过唐诗、元曲、《西厢记》、汉唐小说等课程。盐谷先生一生喜爱《西厢记》，当与此时启蒙不无关联。森槐南去世后，他的学生整理出版了森槐南的授课笔记《作诗法讲话》，该书共六章，前四章讲授中国古典诗，第五章则涉及杂剧传奇，第六章讨论小说。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森先生的课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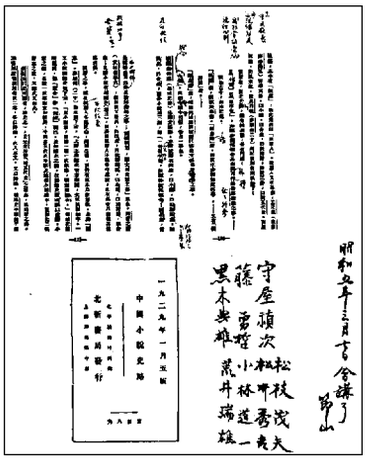
盐谷温先生曾说："关于中国戏曲，与我启蒙的是森槐南先生，而玉成研究是叶德辉先生和王国维君。"他在北京游学的一年间主要学习汉语，随后便赴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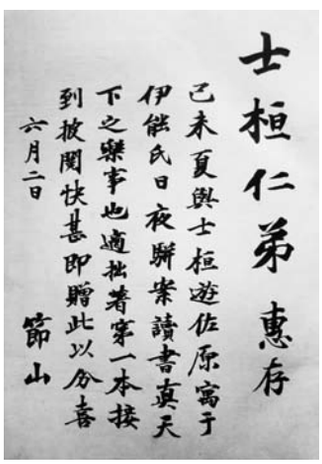
师从叶德辉先生学习元曲、《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戏曲经典。叶德辉与盐谷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其父盐谷青山，叶德辉曾作《日本三君咏》，青山先生便是三君之一。后来叶先生辛亥革命避难时有诗集《南游集》，青山先生则为他作了《书南游集后》。青山先生的文集《青山文钞》有赖盐谷温在长沙时出版，该书由瞿鸿禨题签，王闿运题字，王先谦与叶德辉各作序，阵容不可谓不豪华。叶先生也写过与节山先生相关的诗，记叙二人交游的经历。1927年叶德辉被杀，盐谷温出了一本《叶郎园先生追悼录》，并在东京召开追悼会，由此可见盐谷先生对叶先生的感情。另一方面，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为盐谷温的学位论文《元曲之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可以说，在盐谷温的学术历程中，叶德辉和王国维十分重要。

盐谷温先生的戏曲研究著作主要有《元曲选》、《西厢记考》以及《歌译西厢记》等多种戏曲翻译。而他在小说方面的研究著作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1919年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该书主要按照中国文学的体裁来撰写，上篇以诗词为主，下篇集中在戏曲小说，而下篇又是尤为着力处。此书在中国读者甚众，也有很多中文译本。盐谷温先生的其他著作还有《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一)(二)(三)》、《中国小説の研究》、《国訳晋唐小説》等。"三言"最早的版本其实就是盐谷温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发现的。"三言"在明末有过一个叫《今古奇观》的选本，它自问世之后就在中国一直都很流行，反而原来的"三言"很少被人注意，盐谷先生1926年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三言"全貌关注的开始。此外，盐谷先生还有一项重要贡献即是影印出版了不少新发现的戏曲小说善本，如《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等。1930年，中国开明书店出版汪馥泉译《中国文学研究译丛》，选译了一些日本学者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文章介绍给中国读者，盐谷

温先生与仓石武四郎先生的文章都在其中。



谈到盐谷温先生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大家不难想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年由新潮社出版上卷，1924年出版下卷，在1931年7月北新书局订正版中有他1930年11月25日写的题记，略述因缘："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而盐谷先生1929年在帝大课上也曾与学生一起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该书至今还收在盐谷先生的藏书中。盐谷先生的旧藏书"节山文库"现在藏在天理图书馆。1935年，盐谷温先生的学生增田涉翻译并出版了这本书，题为《支那小说史》。增田涉与鲁迅在上海相识，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去信向鲁迅请教，二人往来信件至今仍有保存，收在伊藤漱平、中岛利郎所编《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中。鲁迅也曾送书给盐谷温先生，并留下题字。不知二人是否曾直接会面，但是通过盐谷先生的学生，他们有过联系，并且看起来关系不错。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仓石武四郎先生的旧藏书籍，即仓石文库，其中有本《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即是盐谷先生送给仓石先生的，上有盐谷先生题字，可以看出盐谷先生对仓石先生的青睐。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一下仓石先生。

仓石武四郎先生出生于1897年，也曾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听过盐谷青山讲课，还参加了青山先生在家里开设的读书会。1921年，仓石先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深受盐谷先生喜爱。然而仓石先生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便离开东京，转而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书，后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讲师、助教授，并于1928年与吉川幸次郎一起去中国北京留学。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仓石文库，据说大部分都是仓石先生在北京时买下的。1939年，仓石先生以《段懋堂之音韵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他以经学、清朝汉学为自己的专业，其实是对岛田重礼、狩野直喜等人学统的继承。同年，仓石先生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而当时东京的盐谷先生退休，仓石先生同时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达十年，期间频繁往来于东京和京都，在当时战乱环境下，交通非常不便，十分辛苦。1958年，仓石先生退休，1975年去世。其著作现在中国出版了两种，即《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和《日本中国学之发展》。

仓石先生的研究和教学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为经学。如《段懋堂之音韵学》，后来还有《仪礼疏考正》，这些应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第二为俗文学研究。他曾写过一部文学史，其中俗文学所占比率相当高。仓石文库也藏有很多中国戏曲小说的书籍，包括程乙本《红楼梦》，据说仓石先生和吉川先生在北京旗人奚待园那里读完了《红楼梦》，这套程乙本就是那时买下的。另外文库中还有一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是孙先生亲自送给仓石先生的，前有题字。第三为中国语教育。在仓石先生之前，日本人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方法基本为训读，包括盐谷先生的国译戏曲也是使用训读的方法来解释，而仓石先生认为，就像要读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先懂英文一样，读中国文学作品也应该先懂汉语。这个想法可能来自于青木正儿先

生的影响。仓石先生说,他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青木正儿的《本邦支那学革新第一步》,提倡中文直读,正是在读完这篇文章以后,仓石先生离开东京,转赴京都求学。他后来出版过不少教科书和辞典,也介绍注音和拼音字母。1951 年,仓石先生创办中国语讲习会,后发展为日中学院。现在我们日本的大学课堂上读中国文学作品,也是先用中文读一遍,再用日语进行翻译解释,这其实是仓石先生以来的方法。

从学术上来说,盐谷先生采用汉文训读,仓石先生采用中文直读;从政治上来说,盐谷先生可以算是天皇派,而仓石先生喜爱新中国。二位先生可以说截然不同,然而他们都致力于中国俗文学研究,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梦依　整理

2014 年韩国燕行文献研究综述

郑珉(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韩东(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大量燕行文献的整理、出版,燕行文献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不再是简单补充地中国史料的不足,它逐渐引起了一批文献学家、明清史学家、东亚关系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当前学界的一种"显学"。同时,燕行文献研究也是韩国学界的重要课题,得助于资料的便利,韩国学界对燕行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早,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这种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韩两国学者的研究缺少相互沟通,重复研究的现象不少,这显然浪费了宝贵的学术资源。本文试图通过对 2014 年韩国学界燕行文献研究成果的梳理,阐述韩国学界对燕行文献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期对中国学者今后的研究有所参考。

2014 年韩国的燕行文献研究成果约为:一般论文 22 篇、学位论文 1 篇、编著 1 部、编译 1 部、独著 2 部。这些成果涉及到了文学、服饰,西学、戏剧、文人交流、时局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为了系统地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论述,笔者将从"文学"、"史学"、"文化学"、"其他学科"四个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类阐述。

一、"文学"方面

韩国学界对燕行文献的文学考察,主要以个别作者在燕行文献中留下的散文、诗歌作品,以及某个燕行文献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与表现手法为中心,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用宏观的视角对整个燕行文献中的某一类文学作品进行的研究。在 2014 年的研究中也基本沿袭先前的这一研究思路,比如金贤美的《疎斋李頤命燕行文学一考》,就是对朝鲜文人李頤命的早期与后期燕行文学作品进行的比较研究,她通过对李頤命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反清意识",与后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对清朝文明的肯定与认同感进行比较,指出了李頤命 18 世纪燕行游览经历对其自身文学转变的影响。又如申斗焕(音)的《关于朝鲜使臣詩文中'医巫闾山'的意象研究》,通过揭示"医巫闾山"在朝鲜士人心中代表着民族自豪与历史认同的特殊地位,阐释了朝鲜使臣诗文中频繁出现的"医巫闾山"的内涵。再如李君善在《陆路使行与汉文学》一文中,把燕行录中的文学作品性质归纳为"报告文学"、"游记文学"、"记录文学"、"抒情文学"四大类进行阐述。

此外,除了这些延续原有研究思路的成果之外,也有对以往研究成果中被误读与被忽略的问题重新进行探讨的文章。比如金东键在《〈热河日记〉与〈医山问答〉的关系再考》一文中,就对先前普遍认为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是受北学思想先驱洪大容《医山问答》一文的影响而作的看法提出异议,通过对"叙述形态"、"内容上的相关性"、"脱稿时间"三个方面的考察,证明了这是一种误解。又如对于一直作为研究热门的《热河日记》,李炫植在《〈好哭场〉:〈热河日记〉隐藏的序文》中关注了朴趾源没有写序文的问题,他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好哭场"一段内容的考察,认为其对

“好哭场”的描述,完全代表了朴趾源写作《热河日记》的初衷,此段文字便是隐藏的“序文”。再如为研究者所熟悉的洪大容《乙丙燕行录》,蔡松花注意到该文中含有大量描写清朝女性日常生活的内容,并结合文中的细致描写手法,对陌生用语以及汉诗的单独注解,还有最大限度的减少学术内容安排等现象,在其《〈乙丙燕行录〉与女性读者》一文中,提出《乙丙燕行录》是洪大容专门为家族中的女性所创作且面向家族女性读者的主张。

当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不乏一些新鲜的“面孔”。以往对单个燕行文献的特点进行研究者虽多,但是对于同一时期不同作者记录的燕行文献特点展开比较的则少见。而具仕会在他的论文中,便对1821年燕行使朝鲜人孙秉周与李元默的使行记录《看山北游录》与《行台漫录》,从“叙述视觉”、“叙述方式”、“叙述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阐述了“燕行录”虽说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寻常的“文艺形式”,但是在具体叙述层面都保留了各自的文艺特点。同时,以往谈到燕行使团对某地的游览以及留下的文学作品时,通常都是从历史文化以及士人心态去解读,很少有人会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现象。而申翼澈在谈到朝鲜后期士人在燕行路途中造访“盘山”以及他们留下的关于“盘山”的游记作品时,便说明这是由于随着明代文学东传,朝鲜士人受到了明代文人袁宏道的《游盘山记》的影响,并且朝鲜后期文人在游览“盘山”后所作的游记,也都能找到袁宏道《游盘山记》的影子。

二、“历史”方面

韩国学界对于燕行文献的历史考察最初是从探讨朝中朝贡关系史开始的,但是纵观历史研究成果,朝贡关系史不是研究的主流,占据研究主导地位的是朝鲜士人如何看待清朝的社会与政权以及如何解读当时的政治局势,另外就是考察朝鲜士人与清朝士人的交流活动了。在2014年的燕行文献历史学研究中也能看到这些痕迹。比如李在庆(音)在《三藩之乱时期(1674—1684)朝鲜的情报收集与时局认识》一文中,便对三藩之乱时燕行使节在清朝收集的情报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燕行使节的报告中有关吴三桂叛军胜利的消息较为客观,而后期失败时收集的情报就不那么真实了,他指出由于受到“华夷观”与“恢复大明”思想的影响,这些燕行使节提供的情报经过有意的筛选与误传。又如在中朝文人交流方面,有从书信尺牍资料入手的。如许敬震在《韩中文化交流的类型与〈石菱受柬〉的地位》一文中,以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时,入朝清军和随从文人与朝鲜士人的往来书信为蓝本,探讨了当时的中朝士人的交流面貌。文中还特别指出了当时作为青年军官的袁世凯与朝鲜士人的往来书信,这对研究中朝交流史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资料。也有从交流场所着眼的。如李春姬在《十九世纪韩中文人交流的‘Meca’:北京宣南》一文中,便对19世纪朝鲜士人同在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居住中国人的交流状况进行了考察,又如中国学者徐毅在《18世纪朝清文人交流场所略论》中分别对18世纪前期与后期的交流场所,以及历次出使旅途中的固定场所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还有以交往对象为中心的,如中国学者孙卫国在《清道咸时期中朝学人之交谊—以张曜孙与李尚迪之交往为中心》一文中,对清道咸时期金正喜与李尚迪的交流情况进行考察,指出继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之后,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流的新特点。

此外,在这一年的历史学论文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从前不曾看到的新视角。比如以往对燕行使行人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三使”的研究,而对下层组织的构造不甚关心,而李贤主(音)在《关于燕行使节中的下隶—以朴齐寅的〈燕行日记附录〉为中心》一文中,就试图通过燕行文献来解读当时燕行使团中“下隶”这个角色。又如,以往对某个燕行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其主题与作者思想,以及表现手法特色的探索,很少有探讨某个作品的形成背景,这其中从历史背景来探讨作品的形成就更少了。而金日焕(音)在《李健命的奏请使行(1721—1722)与〈寒圃斋使行日记〉》一文中,便结合当时景宗朝的政治局势,指出《寒圃斋使行日记》不是一部简单的使行记录,而是作者表达“忠心”,并希望以此作为日后历史评价自己依据的意图下完成的。再如,以往通过尺牍书信资料研究中朝文人交流时也不乏对某个新材料的挖掘与收集,但是却没

有对一个时代的诸多珍贵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解读的。而郑珉在《18世纪韩中文人的文艺共和国》一书中，就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与韩国各大博物馆中所收藏的朝鲜文人洪大容、柳琴、朴齐家、金正喜等，与清朝文人严诚、李调元、纪昀、罗聘等一大批17—19世纪中朝文人间的交流资料进行了介绍与解读。这其中不乏如《蓟南尺牍》、《东华笔话集》等一批学界首次披露的珍贵资料。而如此对大量珍贵资料与众多文人交流情况进行的解读，无疑扩展了中朝文人交流面貌的认识视角，对今后的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大有裨益。

三、“文化”方面

明清交替后，“夷狄”满清入主中原，这让朝鲜士人一时无所适从，但是很快他们就对这个满身“腥膻”之气的清王朝充满了憎恨与好奇。同时，这些燕行使节们在北京通过造访天主教堂，还接触到了西洋的传教士，对于这些“邻居家的陌生人”朝鲜士人同样感到惊奇。所以在燕行文献中可以发现很多对清朝文物与社会生活，以及西洋天主教堂及其与传教士交谈的记载。韩国学界对于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朝鲜士人对异域文化的记载情况，以及受到的“文化”冲击与带给朝鲜社会的影响等方面，2014年的燕行文献文化研究也基本在这个框架内。比如尹庆熙在《关于通过北学派燕行录来看朝鲜服饰的研究》一文中，便通过北学派士人在燕行录中对清朝服饰所作的记录为基础，探讨了这些记录材料对朝鲜后期服饰改革带来的影响。又如鄭恩主在《18世纪燕行使接触的清朝文化》一文中，从“清朝的各种景观”、“天主堂的西洋画与西洋科技”、“热河行宫与佛教”、“朝会时的景象”四个方面总结了18世纪燕行文献中的文化记录情况。关于朝鲜士人在访问北京天主堂后，天主教在朝鲜的发展与朝鲜社会的应对，以及19世纪的“辛酉迫害”之后，朝鲜士人造访俄罗斯馆的情况，申翼澈在《18—19世纪燕行使节的北京天主堂访问及其意义》一文中也作了梳理。再如对于燕行文献中有关公演（戏剧、杂记、魔术）文化记录的研究，中国学者李学堂等人在《老稼斋的艺术素养与燕行文化交流》一文中，对金昌业在《老稼斋日记》记录的公演杂记活动、文化艺术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并且以此探讨了金昌业的艺术素养问题。此外金文京在《朝鲜燕行使与通信使所见所中国和日本的戏剧》中还谈到燕行使中的朝鲜文人虽说对中国戏曲十分关心并留下大量的记录，然而他们对戏曲的态度却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朝鲜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戏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朝鲜文人深受儒教观念的影响，普遍藐视戏曲的价值。这相对于中国戏曲在越南、日本、以及琉球被接纳与吸收的现象，朝鲜社会对待戏曲的态度尤其特殊。金文京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对公演文化进行研究时的单纯文献梳理与作者思想考察模式，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了这些材料背后的实质问题，值得深思。

当然，在2014年的文化研究成果中，申先玉的《关于燕行录中记录的明清時期“声音”的文化意义研究》一文不得不提，因为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通过有关“声音”的记录材料来探讨其内在的文化意义的。申先玉在文中假设了燕行录的作者有通过感觉媒介来展现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认为一部分士人的燕行作品中出现的对宫廷的钟声、音乐以及民间的市井声音的记录描写，实际上分别象征了封建制度的秩序与明清都市经济的面貌，所以她认为这些作者是有意通过用这些看似平常的“声音”记录，来告诉我们当时清朝社会的不同文化面貌。在此抛开文章假设成立与否不说，仅是通过文献中出现的皇宫与市井间不同的“声音”记录材料，是否可能是象征着某种不同的文化内涵来说，其思考问题的视角是新颖和独特的，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燕行文献提供了一些启发。

四、“其他学科”方面

除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之外，在2014年的燕行文

献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成果，比如对燕行文献中同一事物记录材料的整理与翻译，在 2013 年就已经出版过有关天主教相关材料的整理与翻译书籍。2014 年，申翼澈等人又对 18 世纪燕行文献中出现的有关“书籍”与“书画”的材料进行整理并翻译出版。

像这样系统地对某一时期的燕行文献中某一事物类别的记录进行整理并翻译的研究，对于今后研究那个时期朝鲜士人的学风、士人以及社会认识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又如，韩国学者不仅对燕行使在清王朝所感受到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还积极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精神，对燕行文献中的沿途路程展开实地考察。这种集文化与考证为一体的研究视角，应该说开创了燕行文献研究的一个新局面，这一类的研究目前在韩国比较“热”，如果说韩国的燕行文献研究有什么特点，像这样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无疑是值得一提的。如 2014 年出版的徐仁范的《重走燕行路》一书就是期望通过在中国实地的走访调查，来重新理解和诠释当年燕行使与燕行录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这一年中还有一些看似比较“另类”的研究成果，让人眼前一亮。比如许敬震、金永善（音）的《18—19 世纪韩中交流尺牍集的收集与数据库构造方案》一文，探讨的是鉴于尺牍资料在研究韩中文人交流史上的重要性，便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提出了如何系统的解决和整理庞大文献资料的问题，文中涉及的数据传输内容好比就是计算机科学，而资料的分类管理与运用又更像是图书管理学，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以往从“内部”进行研究的惯例，打开了从“外部”研究燕行文献的新模式。又如中国学者张伯伟在《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目前韩国学界把燕行文献统称为“燕行录”的做法并不恰当，他从历史文献传统的角度对燕行文献的名称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认为应该称为“中国行记”，同时还提出了应当避免“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方式与由于史料不足而带来的过度诠释问题。韩国燕行文献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细想起来，似乎一直忽略了对“燕行文献”的学术统称以及资料的运用方法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2014 年韩国的燕行文献研究在延续前人的思路上，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总体上可以看到韩国的燕行文献研究一直在“朝前走”，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目前燕行文献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朴趾源、洪大容、金昌业等一些已经研究的很“热”的文人记录资料上，这种研究对象的“狭窄”现象显然与目前已经出版的具有庞大“容量”的燕行文献不相匹配。又如，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士人观念的改变，在长达 257 年（1637—1894）的燕行中，不同时期的燕行资料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目前以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燕行文献不同时期的特点尚显不足。再如，朝鲜燕行文献与越南、琉球、日本等国的使清文献间的相互印证不够，若运用彼此印证的视角，不仅会使朝鲜时期燕行文献的自身特点更加清晰，也能对朝鲜与朝鲜使行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进行宏观的把握。因此，这些问题是今后燕行文献研究应当格外引起重视的。□

小型学术研究会

（第九十二至九十五场）

新地方史：重新审视微观史学

菅　丰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近年来，被称为“新世界史”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认识被广泛提倡，历史学正朝着超越民族国家的方向转型。但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新地方史”，或者说“微观史学”（micro-history），这个在国家框架下无法被简单诠释的领域。

微观史学的主角是普通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动机“制造”历史（doing history），是在运用历史的同时构筑现实生活世界。本次演讲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实践，并试图说明在今后的地方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应该是对生成“历史”的实践行为和动力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只对“历史”本身。

在西方的史学流派中，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是最有影响的一支，并影响了法国等其他国家。类似的，德国和奥地利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在英国有“个案史”（case history）。而在日本的民俗学研究中，微观史学作为方法论而得到应用，形成了日本“新地方史”的研究。这种新地方史主要关注的是在日本某地存在的“传说”被转换成“历史（的言说）”的过程。

“历史（的言说）”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导入各种各样新的价值和理论，又作为另一个新的“历史（的言说）”被反复建构，最后作为“历史（的事实）”被利用。探讨历史传说之变化，建基于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和对历史的两面性的认识之上，即作为事实的历史以及作为“言说”（叙事）的历史。日本石川县加贺市片野鸭池的“历史言说”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

片野鸭池位于石川县加贺市日本海沿岸的湿地，每年有大量水鸟来此越冬。相传元禄年间（17 世纪末），大圣寺藩士村田源右卫门发明了“坡网”来捕猎水鸟，这种方法成为大圣寺武士的一种锻炼方式，并作为当地传统的猎法被代代相传。根据这个传说，武士以“坡网”的方法捕猎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村田源右卫门的事迹并非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史料能够证明是他发明了“坡网”。实际上，直到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武士才开始使用“坡网”猎鸟。传说的产生与 18 世纪末开始，武士独占了片野鸭池捕猎的经济收入的历史事实相关。由于明治维新时，旧武士失去了

特权，为与他人竞争捕猎权益，村田源右卫门发明“坡网”的传说便应运而生，并帮助武士获得了猎取水鸟资源的优先权。由此，“坡网”创始的传说逐渐历史化。当代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和研究者在回顾片野鸭池的历史时，更进一步肯定了传说中“坡网”三百年的悠久历史，使“坡网”发明的历史言说又具有了新时代的意义。

在“坡网”的故事中，武士的传说被建构成历史的言说，又不断地作为历史事实而被利用和再建构。在其中，每个普通人都与历史紧密相关，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和期待使历史的言说被不断地创造和构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学以及公共历史学发展的可能。

安龙祭土与开财门之仪式在当代云南

Judit Bagi （匈牙利佩奇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文史研究院高级进修生）

腾冲位于中国历史上西南地区的两条重要交通道——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上。“安龙奠土”与“开财门”的仪式在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龙奠土”是云南“地母文化”的一部分。云南地母文化分两部分：庙会和单个家族举行的仪式。前者叫地母会，每年农历十月十八日举行的。地母，在当地又叫地姥。按照腾冲的刘道士介绍：地母会的目的就是“报恩忏罪消灾通过礼拜祈福求情地姥和所有神灵饧福给善男信女各户清吉平安、辛福安康、无灾无疾”；后者叫“安龙奠土”，也称为“谢土”，分为“亡人安龙奠土”（奠阴土）与“安龙奠土”（奠阳土）两部分。前者一般是修好坟墓后或清明节时在公墓举行，后者是房舍建成后在家里举办，其目的都是安位土龙、奠谢五方。

报告人根据 2014 年在云南省腾冲县进行的田野考察，从人类学的角度介绍这些仪式的基本情况。按照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方法，报告人研究的主要观念是亲自进入腾冲社区、长期研究时第一手研究当地资料与根据佛师、道士的话更了解调查对象的祭礼。

这次田野考察时所研究的“安龙奠土”，是指在单个家族举行的仪式。这次介绍的仪式是佛教的，但是实际上是道教的也可以做这个仪式。整个仪式较复杂，共持续三日。第一天是“亡人安龙奠土”（“奠阴土”，也称祭祖），其目的是安位土龙、奠谢五方，因为修坟墓的时候动过土所以要安龙奠土。这个法事是在家族坟墓处举办的。第二天是脱孝，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孝顺而举办的周年纪念，事主父母去逝后满一年或三年要做这种法事，在事主老家举办的。第三天是“安龙奠土”（奠阳土）的仪式，其目的是安位土龙、奠谢五方。

每天从开坛开始至送圣结束。“安龙奠土”仪式的流程表：开坛、诵经、领牲、拜忏、奠五方、送圣与装五子五宝/开财门。奠阳土仪式的过程与奠阴土仪式过程差不多一样，除了地点和诵经不同。修好坟墓以后佛师（当地称先生）决字时间选择吉日。以下简要说明“安龙祭土”的详细流程：

（0）准备仪式：用磁粉来画八卦、五方。准备好经坛、下坛与供养品（上午素坛：供菜：枣、茶，下午荤坛：酒、茶）、纸扎铺（旗、伞、牌位、土科、镇信、龙神、符章）、高钱树。

（1）开坛：祈神奠土。

（2）诵经：度亡灵、求平安（课本：释氏诸品经咒）。

（3）领牲：把生的贡物摆供好。三牲就是鸡、猪、羊（课本：愈加普庵奠谢阴土科）。

（4）拜忏：奠土的忏（课本：愈加普庵奠土法忏）。

拜忏后还得做：a、在解结盘上烧解冤经和百解牒；b、清水和浑水的仪式；c、奠酒的仪式；d、转五方的仪式（给亡人踩地）四步。

（5）奠五方，送圣（课本：阴土科）。

奠五方仪式的目的:敲土、镇土、扫土。循东、南、西、北、中、后土、八卦秩序得介绍:桃弓柳箭(射凶神)、执扫帚、挖一锄、木匠、洒清水。

(6) 交地契:念地契纸(亡人的证明),把公据、戒牒要烧与亡人;装五子五宝 :把五子五宝放在红布里然后放在坟墓上的土里。

"安龙奠阳土"的同时,开财门仪式在家里大门口处举办的。主要部分有:在家堂拜头;给门神准备供养桌、把五子五宝放在红布里,然后把它挂在门口上;开光;把供养的公鸡冠掐破,把鸡血依次点在红布上;按顺时与逆时针方向转供养桌;主人家带红布。

如今,"安龙奠土"与"开财门"仪式一起,作为当代云南社会的重要习俗,至今仍十分盛行。

观音经图——以《高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等为主线

张　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报告以疑伪经与图像结合,用"以经为经"的研究方法。所选是两种有关观世音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即《高王观世音经》与《佛顶心观世音大陀罗尼经》。研究特点是一是从实物角度出发,细致查核每一件经本;二是佛教文献学角度,将疑经本与大藏中真经比对,查核其汲收编撰的情况。把握其产生发展与变化情况,归纳出规律性的发展演进及信向特点。此两种观音经典实际上在国际上都得到过研究,但在此两方面仍有缺弱。

《高王观世音经》产生于东魏年间,是灵验故事与简短疑伪经的结合。正史有纪传,流传至今。鲁迅小说《父亲》中说及将此经烧成灰放逝者手中,当有事实依据。日本桐谷征一、美国学者于君方、国内李小荣及王惠民等皆有所研究,研究之中有些方面较好,如日本学对灵验故事的考查,但对早期资料及经本来源等等皆有失漏。此经最早出现于河南禹县东魏碑刻,但禹县有西魏东魏两通碑,皆为杜氏家族造。早年就有两碑拓本流传,一些金石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出《拓本汇编》将西魏碑与东魏碑混同,将《高王经》归于西魏。笔者曾引用过。后来见于东魏碑上亦有经。再查多处中外馆藏(包括美国富地自然史博物馆)仍未得解。后见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上网资料,有西魏魏全套拓本而不含经,才确切归西魏为错。又曾赴禹县,得观近年又出土之东魏碑,虽有残但经文仍存,更确切东魏碑情况。更重要的早期经本内容全出"真经"。先有五佛名出自《大云经》,中有般若咒赞等,最后一段出自《除恐灾患经》。此皆为别的学者所轻略。《高王经》在宋辽金时有增,西夏时有具扉图西夏本及汉文本。明代万历之母慈圣皇太后所雕镌图文本更是阔大精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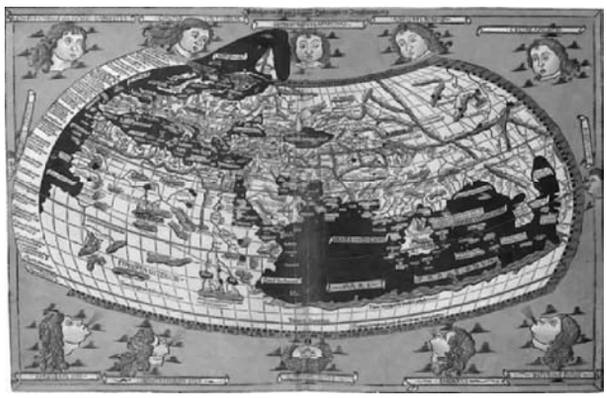
《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共三卷。内有经咒、有灵验故事以及符印。上卷中最核心的四种咒语五种手印,采自唐代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姥陀罗尼经》。中卷疗病催产方(有观音解求冤冤相报的难产故事),下卷有数神验故事(观音救疫病,诵经、写经得保护与得长寿故事等),经末的两个咒语分别为《一字轮王咒》与《自在王除瘟毒咒》,还有解难产的秘字印。此经本也有多种插图本、上图下文本流传。其内容与经咒符印变化错位等,可加以厘清。《佛顶心观世音大陀罗尼》之盛行,实际上说明,唐代密宗或称密教,后来走向通俗化、世间化的过程。原来秘密的咒语手印符咒等,被灵验故事稀释,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用。

在华耶稣会士的地图绘制

Vince Ungvary （国际地图收藏者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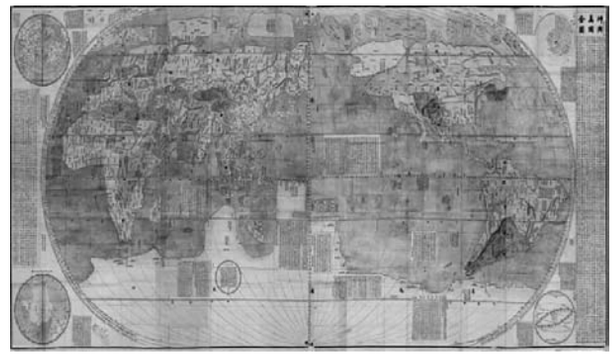
报告以在华耶稣会士的地图绘制为中心，讨论耶稣会士在欧洲与中国两种地图绘制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

欧洲本身具有很长的地图绘制传统，地图在形塑欧洲知识世界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报告一开始就欧洲地图的绘制方法、知识来源等进行的简要的叙述。在报告人看来，欧洲早期的地图绘制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需要绘图者具有地图、历史、地理、美术等多种知识。其主要绘制方法，从13—15世纪的绘本逐渐发展为之后的木刻版、铜刻板等，其中铜版印刷成为地图绘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早期的欧洲地图受托勒密（90—168）地图的影响，对于美洲、亚洲等地区的绘制有许多想象与观念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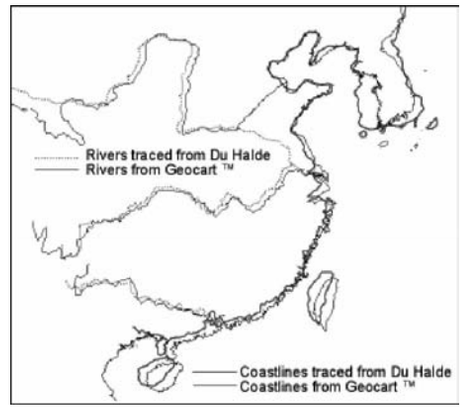
在古代欧洲与亚洲，人们对地图的使用方式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别。对于欧洲人来说，地图虽然有地理、历史学习的作用，但是，地图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是给探险者提供冒险旅途的参考，所以要强调地图的准确性。而在中国，地图似乎更像是一种收藏品，虽然也有因为军事、政治、观念等制作的官方地图，但是地图通常来说是为了显示一种政治上的权力。因此，古代中国的地图与其说是一幅根据地理实际情况而绘制的地图，倒不如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也是欧洲与中国对地图实用型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在华耶稣会士，正是欧洲



与中国不同地图绘制传统的中间者。他们了解欧洲，也同时了解中国，这时候就使得他们在华的地图绘制具有了沟通中西的重要价值。不仅如此，因为利玛窦地图的绘制，将欧洲的地图知识通过图像的方式传到东亚，使得相当多中国人也开始了解欧洲视野下的世界，并影响了中国地图绘制的传统。

甚至到了康熙年间绘制全国地图时，皇帝就选由传教士担任绘制地图的工作。就今天来看，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为其图上绘制的海岸线非常接近与当代GIS测绘所得的中国海岸线。



同时，利玛窦将中国的地图知识也融合入他的地图，就借由耶稣会士的帮助，为欧洲的地图绘制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与欧洲日益新生的探险运动一起，修正了不少托勒密地图中的错误。□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

（第四十四期）

2014 年 12 月 17 日，“交错的文化史”第四十一期研习班，由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冯鸣阳作题为《帝国映射与崇儒教化：南宋画院人物画政治功能的两种类型》的报告。

冯博士认为，为政治服务的南宋画院人物画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帝国映射”，这类人物画热衷于政治宣传，图像内容与政治合法性、复国等问题相关，图像表现则多采用象征和再现的手法。“历史故实画”是这类人物画中的典型，代表作品如《中兴瑞应图》、《晋文公复国土》、《文姬归汉图》、《中兴四将图》等；另一种则是“崇儒教化”，这类人物画采用“图像解经”，即以图像注释经典文本的方式来表现儒家思想、道统承续等内容。这类图画带有隐性的士人倾向，表现出文学性、道德性、偶像性和风俗性四方面的特性，是试图采用较为含蓄的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以士人阶层为代表的文化群体。在带有士人倾向的图像中，士人群体主要指帝王身边的近臣、高级官员、有官位的文人，以及在野的但有一定社会和文化身份的文人。

“帝国映射”与“崇儒教化”两类人物画的区别主要有四：第一，内容不同。“帝国映射”型主要以历史故实画、规谏画为代表；“崇儒教化”型多是图像解经和前代圣贤图像。第二，解决问题不同。“帝国映射”型主要表现的是帝位合法性、帝国复兴、君臣关系等南宋政治中的显性问题；“重儒教化”型主要表现社会秩序、孝道、风俗农事等。第三，采用手法不同。“帝国映射”型多采用以过去的故事来折射当前的现实，采用较为积极的宣传手法；“崇儒教化”型以儒家道统为立足点，采用较为含蓄的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第四，主要受众不同。前者主要是皇族、后妃、帝王身边的近臣，后者主要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普通士人。

我们不难发现，南宋画院人物画的两种艺术取向其实对应着宋代政治史的两个方面：帝王统治与士人共治。南宋官方选取画院人物画是有意识、有目的、持续的国家政治策略，多由帝后大力倡导、甚至亲自参与，集中体现了皇权统治。与北宋文人画初兴时统治者的忽视相比，南宋对于士人文化审美更倾向于接受，可见士人审美体系对宫廷审美体系产生了一定冲击，因此统治者在艺术创造中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儒学、经学的关注，并试图改良使之与宫廷传统人物画融合。这也体现了“士人共治”政治环境下，统治者对于士人文化的关注和对整个士人阶层的重视。

承接北宋画院（尤其是徽宗朝）的绘画传统，又面临着两宋变革与高宗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南宋画院人物画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具有较为严肃的历史使命。北宋末期徽宗朝画院画中大量绘制昭示帝国繁盛的动植物祥瑞，在南宋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天命

神授”意义的人物瑞应。由此可以看出，在南宋，承载着特殊使命的画院人物画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集中地帮助帝王们解决特殊时期的复杂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多借助儒家思想来推动社会的整体风貌改观。儒家思想的最终归宿就是要建立一个效法先王的理想社会，这种社会在儒家是一种以伦理为基调的设计，即希望通过伦理规范的宣传教育为人们自觉接受和遵行来实现这种社会。因此，不管是显性的帝国映射还是隐性的士人诉求，实际上都基于儒家学者推崇的一种价值观：如果合理而巧妙地诠释和再现过往，可以更好地认识并解决当下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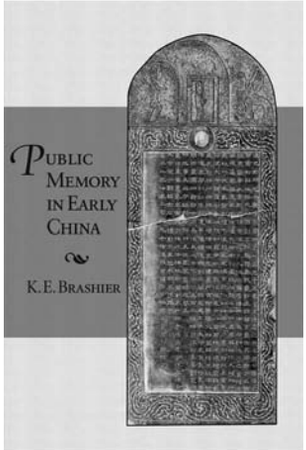
新书介绍

- **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

该书将东亚看作一个互动交流的地域系统，将中国放进这个系统当中去考察其历史和文化问题，以期达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的认知。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侧重发掘和利用周边国家和地区所留存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展开研究，并选择以文献数量、质量情况相对均属最优的朝鲜半岛为对象，研究时段上则将重心放在对近世以来的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成果，通过这些个案的呈现，为东亚互动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这一方法提供注解。

该书由绪论和五个章节组成，绪论从“书同文”、“汉字文化圈”等问题切入，借助“同文书史”的提法，讨论了为何以及如何在东亚范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同时还系统介绍了韩国汉文文献的基础知识和作者对其意义的理解。该书的五个章节分别为：“儒学交涉：十六世纪中后期朝鲜士人眼中的中国学术”、“中华名分：从朝鲜人卢以渐《随槎录》看朝鲜的小中华意识”、“文化比赛：在朝鲜和日本之间寻找‘中国’”、“远邻安南：十七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和“近代转型：十九世纪末朝鲜对中日两国革新运动的观察”。五个章节虽然主题各异，但以一条主线贯穿，即所有个案研究所依据的主体资料都是朝鲜半岛所留存的汉文文献。这些利用朝鲜半岛历史文献所展开的研究，一方面与朝鲜半岛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不仅如此，其中一些个案甚至不限于中、韩两者互动的范畴，而是扩展到包括日本、安南在内的更大的东亚地域范围内的互动。借由这些个案的呈现，作者表达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朝鲜半岛留存的汉文历史文献对近世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应该将视野放宽到东亚，从东亚去观察中国，同时由中国来理解东亚。

- **K. E. Brashier,《早期中国的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 in Earl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June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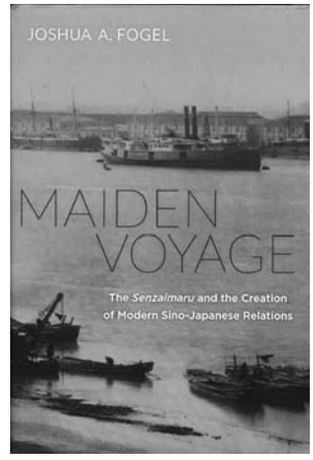


在早期的帝制中国，逝者在后世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印象的形成是由于把他们与现存的公共记忆相联结，而不是吹嘘他们每个人不同而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死后的名字是被从有限的“预定范围”中选定的；对他们的描述源自于经典中的谥号；他们的身份被明确地分类为先贤和功臣。换句话说，对祖先的纪念是一套模式化的程序，将固定的模式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者一刀切式地给他们贴上标签。《早期中国的公共记忆》就是对这样一本模式化的程序进行检视的书。

Brashier 通过对早期帝制中国相关记载的研究，他确定了三个明确的身份参数——姓名、年龄和亲属关系——并以此判定该人物在他后世集体记忆中的相关位置。随后，他又考察了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成为汉代公共记忆中的基本认知。（范予晨）

- **Joshua A. Fogel,《首航：千岁丸号与近代中日关系的缔造》*Maiden Voyage: The Senzaimaru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ptember 2014.**

本书主要讨论 19 世纪 60 年代中日使团交流中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 1862 年幕府的第一次遣使——“千岁丸”（Senzaimaru）的上海之行。这次日本使团的出行面临着特殊的国内外背景。19 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相继叩关，江户政府逐渐改变了闭关锁国的



体制，幕府最早于 1860 年（万延元年）派遣使节团访问美国，之后日本使节团多次赴欧美诸国进行访问，对日本的开国、维新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日本的开国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欧美的关注，对与日本同样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中国也有着密切的关注。此时的中国面临着列强入侵、鸦片输入、基督教传播、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关注着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力图以此为借鉴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思考，从中国的处境中获得应对世变的教训。上海作为贸易港口及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成为日本观察中国与西方的双重窗口。

本书指出对于“千岁丸”上海之行的重要性应当有适当的认识。应当看到，在此次使团出行之前的过去三个世纪，中日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中国的商人、画家、医师、僧人等人员通过商船抵达日本长崎，与日本的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与联系。1862 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其人员亦十分混杂，但是其中包括一部分的幕府官员，其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中国建立起邦交与通商关系。来到上海以后，日本使节团成员对上海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这些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见闻录。此次随团出行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高山晋作，在乘坐“千岁丸”来上海之前，作为攘夷志士，高山晋作的思想便已经十分成熟。上海之行使得高山晋作更进一步地观察到中国的状况，也看到日本本国的痛处；在思考中国衰微的原因的同时，他也反思日本的处境、寻求日本本国的对策。在上海所目睹的殖民地人民的状况，使高山晋作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势力与野心，并从排外主义转变为保护民族的立场。

关于幕府末期日本人的中国观，本书就“千岁丸”上海之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千岁丸”使节团的成员们对所见中国诟病的批评与讨论，并不使

得日本人轻视与责难中国人民及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尽管他们对清朝政府及其采取的许多措施不认同，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使团之行标志着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以及日本人轻视中国的开端。

日本“千岁丸”使团于1862年在上海停留一个月，此行处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间和空间交叉点，透过这次访问日本以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书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探讨，展现出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面向，以及近代中日关系的相关状况。（赵丹坤）□

外刊撷英

Issac Yue,《狡诈的邪恶和道教的妖术:重新思考〈平妖传〉的文本历史》(Vulpine Vilenes and Demonic (Daoist) Mag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extual *History of Suppressing the Demons*), *Ming Studies*, No. 69, 2014. 5

现存的《平妖传》共有两个版本。其一,被称作"三遂平妖传",很多人认为这是较早的版本,一共有二十回。另一个则有四十回,被认为是较晚出的版本,甚至就是前者的续补。照这样来说,四十回《平妖传》中,应当有很多独特的因素是二十回本中也有的,事实上却与此相悖。欧阳健曾提出四十回本是原始版本,而二十回本是后来的缩减版一说法。尽管欧阳健的理论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但它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不是有一个现存两种版本之外的原始版本。

"平妖传"是依据南宋时王则叛乱的历史来创作的。在正史记载中王则是以佛教为号召叛乱的,但在小说中叛乱的宗教背景却表现为道教式的。小说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不是王则,而是一个叫胡永儿的女人,是她用道教法术帮助王则起义。四十回本交代了胡永儿的来历,在二十回本中则没有。四十回本中的胡永儿无疑是邪恶的,但在二十回本中却不同,似乎她只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

之后作者讨论了狐妖的形象。早在隋代,狐妖的形象是拥有超自然力量和邪恶的特性。在宋代由于新儒学的兴起,性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正当的,狐妖作为邪恶女性的象征得到了加强。如果胡永儿这个人物在南宋口头表演的"王则"故事中就已经出现了,那她放纵、邪恶和具有法术的特性应该是和那个时期对狐妖的观念相符合的。这可以在四十回本可以得到证实,而二十回本中却奇怪地缺失了。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二十回本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或是一个更老文本的缩写本。

为了补充"平妖传"是从口头故事发展到文本形式的推测,作者接下来讨论了小说中法术和道教的因素。明代很多小说习惯性地把法术和道教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不难理解在王则的故事被通俗化的同时,原先在叛乱中发挥作用的佛教法术被狐妖和道教法术所替代了。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王则的故事在《醉翁谈录》中被归在"妖术"类。

据此,作者推断"平妖传"可能有一个口头的原始故事版本,是二十回本和四十回本共同的母本,但这个版本现在已经不可见了。

Komine Kazuaki,《从东亚视角看作为"法会文艺"个例的"愿文"》(The Ganmon as an Example of the "Ritual Arts and Literature": The View from East A-

sia), *ACTA ASIATICA*, Vol. 105, 2013.

本文作者考察中、日、韩三国愿文文献(在佛教仪式中赞助人表达愿望的书面文本),希望探讨愿文的表达模式和它作为"法会文艺"个例的重要性。"法会文艺"在作者看来包括仪式中的讲演、文本和物质材料,也包括由仪式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的讲演、文本和物质材料。

愿文是在一个仪式的开头由职业僧侣念诵的文本。单篇的愿文因为实际需求被搜到一块儿、分类编成了集子。这在日本的11到13世纪达到了高潮。在日本愿文对文学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日本的《本朝文粹》中愿文是按照用途被分成了几大类。在中国,陈晓红把敦煌愿文分成了五类:礼仪、修持、祈福禳灾、丧葬和综合类。这种分类在东亚是有共性的。对于愿文结构最有名的一个分析是把愿文分成了十个部分,但愿文的长度是灵活的,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增加或减少某一部分。愿文对于一个职业僧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必须提前仔细阅读愿文,并作出一些适当的调整。愿文和发愿文有很多相似点,都包含了各种书面的祈愿,但是在根本上两者并不相同。愿文是整个仪式中起引导作用的一部分,而发愿文不是。

接下来作者用日本的《江都督纳言愿文集》和中国的《敦煌愿文集》来具体分析愿文中的几种表达方式。关于"树"的表达在愿文中很常见。有一些词汇是东亚共享的,比如"风树"。但是也有一些词汇的含义在中国和日本是不同的,比如"红林"。在愿文中表达季节的词汇也很重要。有一些特定的描绘季节的词汇也是东亚共享的。

最后作者将关注点转向韩国。作者简单介绍了几篇愿文,可以看到在韩国历史各个时期都有愿文的写作,它的重要性值得注意。

向井佑介,《墓中的神坐——汉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内祭祀》(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東洋史研究》,第73卷1号,2014年6月。

古代中国的神坐一般设置于宗庙,祖灵祭祀也在宗庙进行。但由于祖灵观念的变化,汉代流行建造模仿宅第和宫殿的大型墓室,从而开始出现在陵墓中设置神坐及进行祖灵祭祀。这种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继续,为了阐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死者灵魂的认识,有必要分析该时期墓室内神坐的变迁。

汉墓中常设有"便房",即相当于墓中的神坐,是安顿墓主灵魂之处。"便房"设置在安放棺椁之处的前面,两者在空间上便有所区别。汉代的神坐主要由庄、案、蓆等陪葬品来组成。汉魏晋时期墓室内神坐的位置可分为前室或墓室前面、侧室及壁龛、墓室后面等三种类型。西汉时期有第一类型的出现,东汉时期除了中、小型墓仍然沿袭第一类型之外,有些大型墓葬里出现了第二类型,魏晋时期随着单室墓的流行,第二类型逐渐衰退,主要采用第一类型,一些墓葬也有第三类型。

东晋南朝时期,受魏晋时期以来薄葬流行的影响,墓室结构以及陪葬品都得到了简化。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神坐还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墓中祭祀也仍然继续。东晋南朝的墓葬常常在棺台前面用砖制造象征"庄榻"的祭台,祭台附近还出现屏风、凭几、香炉等陪葬品,这些搭配在东晋时期非常普遍。东晋时期有过一场"招魂葬议",从此可见当时围绕墓中神坐的理解,与礼制规定和世间习俗之间有所矛盾。

北魏初期,受鲜卑原来的墓葬观念的影响,墓葬规模和陪葬品都极其简单,也没有墓中祭祀的观念。在迁都洛阳以后,墓室逐渐被视为墓主灵魂的所在地。但北魏时期不像东晋南朝般设置独立的神坐,当时墓主身体和精神被视为密不可分的存在,因此两者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墓中祭祀也在棺椁所安置的石庄前面进行。到了北齐时期,冥器和神坐才开始分开布置。

关于唐代,《大唐元陵仪注》所记载的丧葬仪礼与北朝的传统符合,可见唐代皇帝葬礼无疑沿袭着北朝制度。唐朝继承的大部分是北魏在洛阳迁都后所定型的制度,那个时候墓中祭祀在棺椁所安置的石庄前面进行。但这种情况其实导致凶礼的祭祀对象"魄"和吉礼的祭祀对象"魂"混在一起,其原因可能在于胡族难以理解礼仪上的意义。这种魂魄的问题,通过北齐时期的结构变化得到了解决。

墓葬中设置神坐的传统,唐代以后也仍然存在。比如,北京明十三陵之一定陵,万历帝和两位后妃的棺

椁放在后室，与此相应，中室有巨大的三座神坐。可见，墓葬中设置神坐的传统，自从汉代出现以后，一直到近世仍然继续。

古松崇志，《契丹与宋之间的国信使与仪礼》（契丹·宋間の国信使と儀禮），《东洋史研究》，第73卷2号，2014年9月。

契丹与宋经过多次战争后缔结澶渊之盟，两国皇帝互换盟约誓书，明确规定禁止侵犯对方国境和造营军事设施，并互派国使维持更长久的和平。关于国使，中国治宋史的聂崇岐、治辽史的傅乐焕等前学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阐明了这一制度的要点，并整理完成了两国国使派遣一览表。近年来，曾经不太被重视的宋代外交史研究也开始升温，然而这些研究多倾向于以礼仪为题材，重点研究的是宋朝的外交制度和国际秩序，而对于契丹和宋两国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两国外交的礼仪上，仍有不少可供探讨的余地。

本稿即是对作为支撑契丹与宋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制度——国使制度及其相关礼仪，从契丹和宋两国方面进行的比较解读。具体而言，首先，概述了两国国使在到达对方国都之前，沿途的馆驿、设宴等接待流程与礼仪，以及到达之后的日程安排。通过比较发现，契丹与宋接待对方国使的礼仪大致相同，由此可以推测澶渊之盟缔结时，契丹与宋大约也商议了两国如何互派并接待国使的细节。

其次，解读至关重要的朝见、朝辞仪式，尤其重点讨论了国书的授受及皇帝召见国使的问答礼仪。文章通过对朝见、朝辞礼仪结构的整理，将国使的行动分为作为本国皇帝的代理和作为对方国皇帝的臣僚两种，并指出礼仪的核心是国使作为本国皇帝的代理所行动的那一部分。另外，通过与《大唐开元礼》的比较，以及对两国国使服饰、语言的细致剖析，指出契丹与宋之间国使礼仪的独特性，就在于两国虽在表面上实行对等外交，但受缔结澶渊之盟时两国军事力量的差异制约，宋朝在礼仪的细节上对契丹有不少让步。

最后讨论了契丹举行国使朝见礼仪的空间。契丹朝廷迎接宋朝国使的礼仪，沿袭唐代而来，其实质是汉代礼仪，举行礼仪的场所以游牧王朝移动式的天幕为中心。被派遣入宋的契丹人也保持着契丹族特有的服装、语言和行为，去参加宋朝的礼仪，从这点来看，契丹和宋之间的国使制度，是将中国王朝和游牧王朝的传统要素结合在了一起。

总之，由于澶渊之盟的缔结，契丹和宋之间互派国使往来，国使通过国书及传递皇帝的话来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契丹和北宋这种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国使制度，之后也被金国等周边国继承，影响了多国的体制，为欧亚史上王朝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丰岛悠果，《金朝的外交制度与高丽使节：1204年贺正使节行程的试复原》（金朝の外交制度と高麗使節：一二〇四年賀正使節行程の復元試案），《东洋史研究》第73卷第3号，2014年12月

在高丽王朝延续475年的统治期间，先后接受五代诸朝、宋、辽、金、元、明的册封，在动荡局势中灵活地展开事大外交。高丽与宗主国的关系中，宋丽、元丽关系影响最大、最受关注，而高丽与辽、金先后长达百余年的宗属关系，则由于史料限制，未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以高丽武臣政权时期的文人金克己于1204年贺正使使行中所撰述的三十余篇文字为基础，参照金、丽之间定期派遣使节的惯例及金朝接使制度，讨论两国使节往来的形态。

高丽于1170年、1196年分别经历了武人郑仲夫、崔忠献发动的政变，武人政权时期，为得到金朝册封以巩固正统地位，因而成为高丽慎重事金的外交安定期。高丽神宗六年（1203）派遣的高丽贺正使节团，李延寿为正使、金克己作为书状官随行。于1203年十一月中上旬派遣，次年2月下旬回国。金克己有诗文之才，出使时任职于翰林院，其记载收入高丽后期编成的《东人之文四六》，以及朝鲜初期的《东文选》。此外，作者还据《金史·礼志九》、《大金集礼·朝会》中有关“元日、圣诞上寿仪”、“外国使入见仪”、“曲宴仪”、“朝辞仪”的记载，结合南宋派往中都燕京的使节留下的日程（包括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辔录》、周煇《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复原出金朝接使的若干细节，尤其

是对宋、丽、西夏三国使节班次序列的讨论。

金、丽之间的使节往来，除非定期的册封、吊慰、报谕、告奏等使之外，也有定期使节往来，包括金每年派往高丽的贺生辰使、三年一度的横宣（赐）使；高丽派往金朝的谢礼使、贺圣节使、贺正使、进方物使等。接使时，沿途护卫、整备都成为沉重的负担。因此辽曾将圣节改期，以便同时接待贺圣节使与贺正使。又每年十一月后半至正月恰值农闲，高丽便将使金的贺正旦、贺圣节使合并发遣，并与金派遣来的贺生辰使节的出行尽量吻合，以减轻沿途地方负担。

自1153年金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至中都燕京后，贺正使节的目的地即为燕京。这是朝鲜半岛诸王朝派遣燕行使的早期阶段，对考察此后朝鲜向元、明、清各朝所派遣的燕行使的制度变迁，也有参考价值。最后，作者以金沿袭宋、辽外交仪制中使节停留都城十日之制及举行“花宴”为例，提出应重视金朝外交制度中来自宋、辽制度与文化的影响。

武上真理子，《汉译地质学书籍中所见的“西学东渐”：以江南制造局刊〈地学浅释〉为例》（《漢譯地質學書に見る「西學東漸」：江南製造局刊『地學淺釋』を例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73卷第3号，2014年12月

《地学浅释》是英国人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所著《地质学纲要》第六版（1865年）的汉译本，1871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地学浅释》所得的评价甚高，重点在于其在清末政治、社会改革中对知识人所发挥的影响力，尤其是书中早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齐一说”，在严复《天演论》之前就向中国传播了“进化”的概念。文章通过此书的翻译和流通过程，考察19世纪中叶作为近代科学的地质学，从欧洲到汉字文化圈的“东渐”诸相，及西方学术对中国、日本近代学科形成的影响。

《地质学纲要》于1838年初版于伦敦。作者赖尔原本构思为已出三卷本《地质学原理》的第四卷，而在执笔阶段才改为撰写地质学的“入门书”。当时英国地质学界仍然是“自然神学”占据主流，认为探明自然法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造物主的伟大。在这一基本认识上，赖尔也不例外。赖尔的三卷本《地质学原理》曾影响了达尔文，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曾受到赖尔资助。但这并不意味着赖尔很快地转向了“自然选择”说。值得注意的是，《纲要》原书第六版的改订，新增了表明舍弃“齐一说”的一条注脚。这意味着赖尔在“进化论”与“激变论”之间的新立场，全书在这一观点上的含混不定，也直接导致中译本的模棱两可。

上海江南制造局于1868年下设翻译馆，从事西学书籍的汉译，当年即购得《地质学纲要》新出的第六版。翻译采取“西译中述”的方式，由中国人和欧美人共同翻译。中文笔述者华蘅芳（1833—1902）是数学家和教育家，提倡实学，著有《行素轩算稿》，并在上海格致书院、天津武备学堂、武昌两湖书院等校执教。《地学浅释》出版的次年，便被引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当时急于直接向西洋诸国学习科学技术、使用欧美原著作为教科书的东京大学理学部及工部大学校，尽管该书仅被列为参考书，但仍受到柳原前光、久米邦武等知识人的喜爱。后又经乙骨太郎乙训点，刊行了和刻本三十八卷。

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只有在初步具备了“进化”作为公理被接受所需的思想、社会条件后，《浅释》才被归为进化论一类的书，而非相反。《地学浅释》所展现的多种多样的远古地质年代灭绝物种的化石和骨骼，曾给当时的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康、梁等人从中获知的世界进化的样貌，恐怕也契合、刺激了他们变法、革新的思想。□

吴洪斌、郭雪妮、杨琴　摘译

第五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招生启事

2015 年 6 月 24 日——7 月 3 日

为促进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外学生交流与培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复旦大学(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合作开设第五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

一、招收对象

1. 欧美各大学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 15 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2. 上海市各高校人文学科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15 人;

3. 日本、韩国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 5 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二、日程安排

上课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01 室。

6 月 24 日(周三)　报到

6 月 25 日(周四)　东亚知识与艺术

柯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Problems of Texts and Authorship in Early China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作者问题

颜娟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 初唐佛教艺术图像学

6 月 26 日(周五)　课程考察(上海博物馆等)

6 月 27 日(周六)　晚明文化与文学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Policy Questions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at do they tell us? 晚明科举策论:它们告诉我们什么?

大木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晚明的出版与文学

6 月 28 日(周日)　课程考察

6 月 29 日(周一)　西学东渐与东亚回应

川原秀城(东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西学和朝鲜实学

王国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教授) Late Qing political economy and how to understand what is old and new, Western and Chi-

nese 在新旧与中西之间:晚清的政治经济

6 月 30 日(周二)　课程考察

7 月 1 日(周三)　自由活动、撰写课程论文

7 月 2 日(周四)　上午:分组讨论

下午:结业典礼

7 月 3 日(周五)　退房、结束研修班

三、费用

学生自己负责:往返上海的机票费及机场到复旦大学的交通费。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1、日程中安排的参观考察费用;2、外国学生在夏令营期间的住宿费;3、所有学生在夏令营期间的餐费。

四、学分和证书

参加研修班的复旦学生修满课时,可得一个学分;结业时,将向全体学员发放结业证书。

五、报名

报名表:上海学生、日本韩国学生将附件"申报表"填写后请导师签署意见;报告表请于文史研究院首页下载。

报名时间:2015 年 3 月 4 日—4 月 10 日;

投寄方式:

1. 将报名表格投到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 楼信箱"暑期研修班"

2. 或者邮寄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办公室收 200433

3. 或者可以将签字的申请表扫描后发到 wsyjy@fudan. edu. cn。

联系电话:86-21-55665284 。

＊＊欧美学生报名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组织,可联系艾尔曼 Elman@ princeton. edu。

六、入选名单公布

公布时间:2015 年 4 月 20 日左右;

公布渠道:文史研究院网站 http://www. iahs. fudan. edu. cn。□

2015 年文史研究院博士后招聘启事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简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10 日，是复旦大学“985 工程”支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作为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性、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文史研究院致力于沟通文史哲不同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努力推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也重视各种新文献和新资料的整理。文史研究院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己任，目前已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接受海内外年轻学人来院继续研究。

申请资格

凡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博士毕业年限不超过 2 年，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均可申请。

招收、申请及录用

（一）申请者需提供以下材料：(1)本人简历；(2)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其他有关的有效证明文件（应届毕业生可先递交申请表，待论文通过答辩后，再递交论文通过答辩证明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3)博士论文全本；(4)硕士、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一览；(5)本人拟在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及研究工作的初步打算。

（二）经初审拟考虑接受申请的，(1)申请人可登录全国博士后交互式网上办公系统（www. chinapostdoctor. org. cn），填写进站相关信息，具体见《关于开通博士后进站申请网上办公的通知》。(2)属国家统招统分的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由培养单位的研究生院在申请表的有关栏目注明“属于国家统招统分应届毕业博士生”，并加盖公章。(3)属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在职工作以及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人员，还需提供原单位人事部门或所在部队政治部或干部部，同意其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证明材料，同时注明对其出站后工作去向的意见。(4)申请者在递交《博士后科研人员申请表》时，还需要递交两位本学科领域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信。(5)留学博士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由国家按国内同类人员的标准进行资助，申请手续同国内博士。留学人员还需另外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推荐意见》或回国人员证明。

（三）每年 5 月（讨论 4 月底前递交的申请材料）和 12 月（讨论 11 月底前递交的申请材料），工作站将组织对申请人有关材料的审核。(1)由工作站专家组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对申请者的政治思想表现、科

研能力、学术水平和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等进行考核评议，视条件可进行面试或采取其它方式进一步考核。(2)经审核同意接收的，由本工作站发给初审通知。(3)待材料齐全后报学校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再由学校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发给正式录用通知书。

相关福利待遇

基地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优厚的研究条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薪酬标准参照国家和复旦大学的相关标准，根据研究进展和贡献给予适当补贴。其它方面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其它相关事宜

体格检查、博士后公寓、户口及配偶随迁、子女入托等事项，请参见《复旦大学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简章》。

研究方向及合作导师

1. 思想史与文化史、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 葛兆光教授

2. 中国思想文化史，礼学和礼仪制度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文化研究 杨志刚教授

3. 考古与艺术史　李星明研究员

4. 中外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明清史，东亚海域史，科技史等 董少新研究员

随着文史研究院和本工作站建设的进一步展开，研究方向将会有所增加，合作导师也将有所增益。竭诚欢迎各相关领域有志于深造的博士来站工作。

截止日期

上半年：2015 年 4 月 30 日

下半年：2015 年 11 月 30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军（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04 室）

电话/传真：021-5566 5284

邮箱：xjfd@ fudan. edu. cn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5.1.1—3.31）

• 2015 年 1 月 5 日—2 月 15 日

我院助理研究员段志强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

• 2015 年 1 月 6 日

我院举办第 93 场小型学术研究会，匈牙利佩奇大学（University of Pécs）人文学院欧洲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匈牙利科学院东方部图书馆馆员刘方（Judit Bagi）作题为《安龙奠土与开财门之仪式在当代云南》的学术报告，我院博士后陈铮任主持。

• 2015 年 1 月 8 日

我院副研究员张佳、助理研究员段志强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分别作题为《明朝初期的汉族元遗民》、《晚清中国的禁书阅读》的学术演讲。

• 2015 年 1 月 14 日

我院助理研究院段志强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作题为《作为纪念物的年谱：以十三种顾炎武年谱为中心》的学术演讲。

• 2015 年 1 月 14 日—20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教授、我院学术委员大木康作为 2015 年度复旦大学外国高专计划第一次来访，期间与杨志刚院长洽谈了学术合作事宜。

• 2015 年 1 月 15—16 日

我院朱莉丽副研究员带队，携我院及中文系数名博士生赴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两岸三地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生论坛”。该论坛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办，来自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台湾大学的三十余名师生参加。

• 2015 年 1 月 26 日

我院举办第 94 场小型学术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总作题为《观音经图——以〈高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等为主线》的学术报告，我院孙英刚副研究员任主持。

• **2015 年 1 月**

《中华读书报》评选 2014 年年度学者，我院葛兆光教授当选。

王鑫磊著《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作为我院“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系列”第三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辑刊载朱溢副研究员的论文《北宋对外交往机制的另一面——以〈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载为线索》。

北京师范大学郭雪妮博士进入我院博士后工作站，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为《平安朝公卿日记之中国记事研究》，合作导师为杨志刚教授。

光华人文基金讲演集、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由三联书店出版。

“复旦文史丛刊”第二辑第一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大木康教授专著《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博士生李鸿坤（Bony Schachter）的论文《〈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第一品译注》发表在国际汉学界的重要期刊《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 62 卷第一号。

• **2015 年 2 月 23 日—4 月 23 日**

我院副研究员邓菲在法国雷恩第二大学访问并任客席教授，课程为《中国古代的绘画与文献》。

• **2015 年 2 月**

我院董少新研究员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头衔，任期为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期间将与该校人文学院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文史知识》2015 年第二期发表孙英刚副研究员的论文《武则天是宣扬自己弥勒下生吗?》。

• **2015 年 3 月 6 日—9 日**

李星明研究员参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题为《北朝墓葬中的婆罗门教图像因素——以多臂神为例》的学术论文。

• **2015 年 3 月 13 日—19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教授、我院学术委员大木康作为 2015 年度复旦大学外国高专计划第二次来访。并于 3 月 16 日由我院与中文系合办，作了题为《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小史——以盐谷温和仓石武四郎为中心》的学术演讲，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任主持。

• **2015 年 3 月 16 日—21 日**

我院与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科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在京都举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志强带领文史研究院及中文、历史等相关学科的 13 名博士生与会。

• **2015 年 3 月 20 日—21 日**

葛兆光教授在香港大学参加“现当代中文语境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精神”国际讨论会，发表题为《对“天下”的想象》演讲。

• **2015 年 3 月 22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 **2015 年 3 月 23 日**

我院举办第 95 期小型学术研究会，国际地图收藏者协会会员 Vince Ungvary 作题为《在华耶稣会士的地图绘制》的学术报告，由哲学院教授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主持。

• **2015 年 3 月 23 日—24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何为中国，何以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解释“中国”的困境》的主题演讲。

- **2015 年 3 月 27 日**

杨志刚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校长尼克·凯伊(Nick Kaye)带团来到文史研究院访问,商议对方合作事宜。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李星明、白若思、王鑫磊参加了洽谈。中华文明中心金光耀教授、历史系张巍教授也一同参与商议。

- **2015 年 3 月 28 日**

文莱大学副校长唐志强教授来访我院,我院葛兆光教授、董少新研究员及朱溢副研究员参加了接待,双方表达了交流合作的意愿及可能性。

- **2015 年 3 月**

孙英刚副研究员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合作主编的论文集《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作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第一辑的一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大历史学报》第四十七号刊载朱溢副研究员的学术论文《唐至北宋时期宾礼的礼仪空间》。□

金秀英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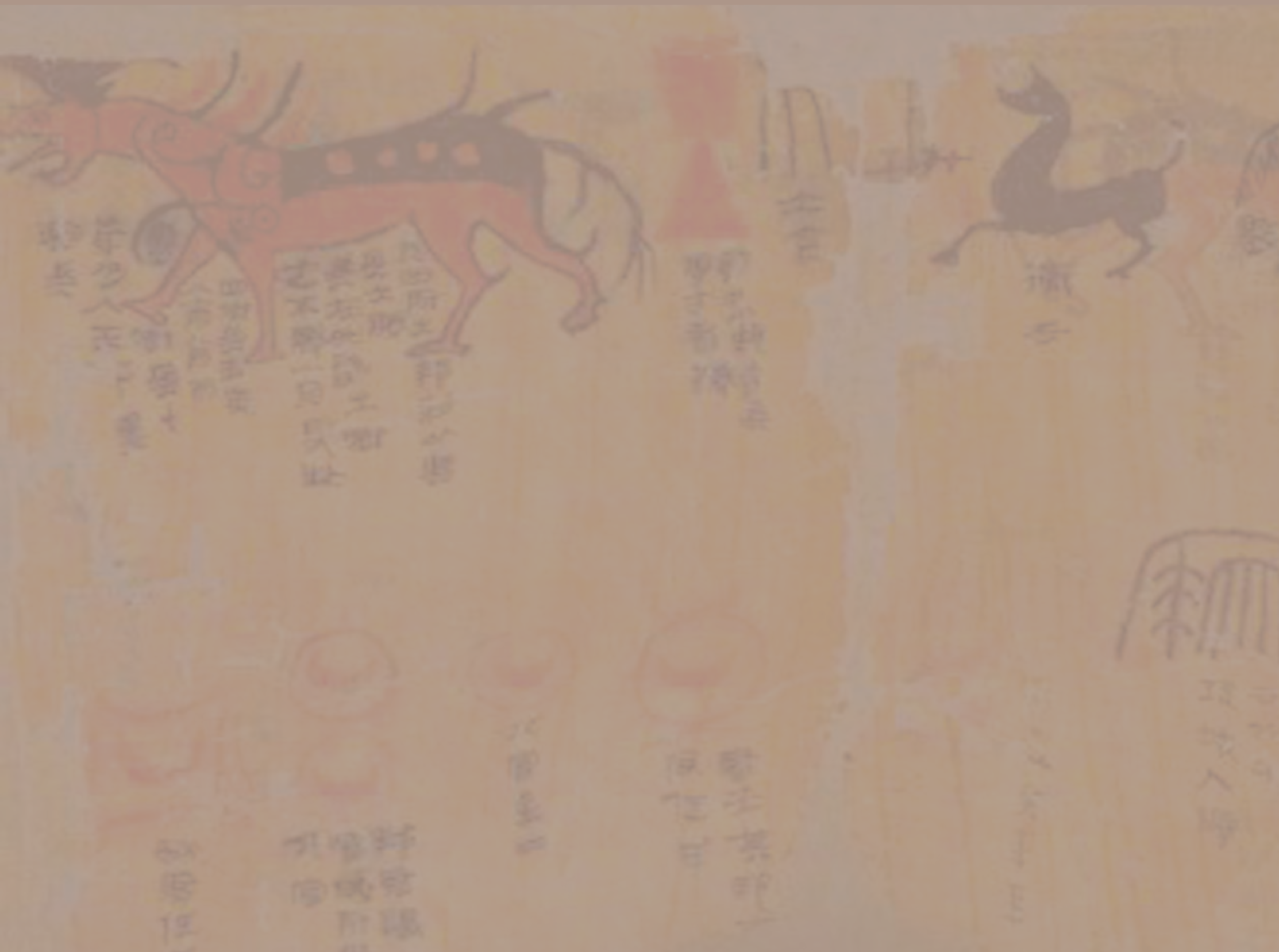
2015年1月8日，我院张佳副研究员、段志强在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学术演讲，题目分别为题为《明朝初期的汉族元遗民》、《晚清中国的禁书阅读》。1月14日，张佳、段志强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作题为《明朝初期的汉族元遗民》、《作为纪念物的年谱：以十三种顾炎武年谱为中心》的学术演讲。

2015年1月，我院助理研究员段志强访问东洋文库，并与日本学士院会员田仲一成先生合影。

2014年12月1日，文史研究院小型报告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报告《新地方史—重新审视微观史学》。

2015年1月26日，文史研究院小型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研究员报告《观音经图——以<高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等为主线》。

2015年3月27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校长尼克·凯伊(Nick Kaye)带团来到文史研究院访问。



封面题字　王元化

封面底图　帛画云气占图（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

编　　辑　杨琴、肖军、钱云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j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